



是西域，也是西洋—— 十五世紀明朝與忽魯謨斯的接觸

■ 陳國棟

歷史上，中國人把甘肅河西走廊以西的地方叫作「西域」。明朝人卻也使用「早西洋」一詞來稱呼同一塊地理空間。「西洋」一詞通常係指船舶自中國沿岸南行，在到達越南南端以後轉而向西，此後一路所到的地方便屬於西洋。明成祖、宣宗時代，鄭和（1371-1433）奉命出使亞、非國家，就是走這條海路，所以說是「鄭和下西洋」。不過，鄭和自己留下的紀錄卻也說他是前往「西域」。研究發現：這是因為鄭和在第四次、第五次下西洋時，前去到了波斯灣頭的忽魯謨斯，在那裏登陸後，可能還從陸上前往帖木兒帝國的首都哈烈，發展兩國的關係。明朝的使節一般都經由陸路到哈烈，走「西域」一途，鄭和則主要取道「西洋」航路。就前往忽魯謨斯或續往哈烈而言，所去之處既是西洋，也是西域。

前言：西域被叫作旱西洋

明代文人陸容（1436-1494）在其所著《菽園雜記》書中講到了下面一段事情。他說：

天順七年（1463）二月十二日，兵部特旨遣使臣下旱西洋：曰哈列地面，曰撒馬兒罕地面，曰哈失哈兒地面，曰阿速地面，曰土魯番地面，曰亂加斯蘭處，各正副使一員，皆外夷人仕中朝者。

依據《明史》〈西域傳〉的說法，「地大者稱國，地小者止稱地面。」「地面」大概用來指較小的國家。不過，陸容提到的「地面」實際上幾乎都是當時中亞和西亞的大城。唯獨亂加斯蘭（?-1479）是個例外。他是天順、成化年間西蒙古的首領，但在這段時間他的領域不斷遷移，從哈密附近漸次遷移到河套，因此直接用

亂加斯蘭處而非用實在的地名來指稱他所管轄的地方。同書也提到：「成化辛丑歲（十七年，1481），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撒馬爾罕（Samarkand）在同一本書中既被算作「旱西洋」的一處地面，但也被認為屬於「西域」的範圍。（圖1）

歷史上，中國人把甘肅河西走廊以西的地方（包括現今的新疆、中亞、阿富汗以及西亞等國的範圍）叫作「西域」。宋元時代，中國船隻南下到現今越南南端以後，採用大致往西行的方向行進，前往印度半島，因此海路所到的地方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稱為「西洋」。然而陸容（可能也包括他的同時代人）卻使用了那個有趣的名詞「旱西洋」來指稱從哈密，吐魯番一直到伊朗或者更遠到土耳其的一大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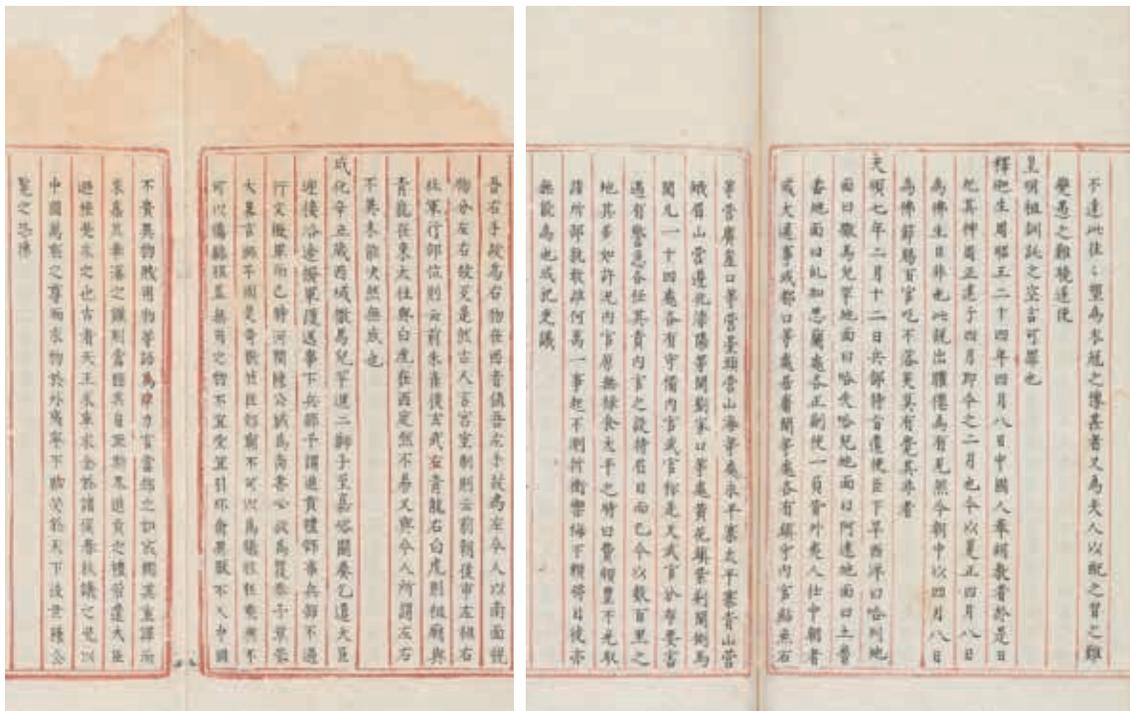


圖1 明 陸容《菽園雜記》明朱絲欄鈔《國朝典故》本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2810442\\$11041](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2810442$11041)；[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2810442\\$11381](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2810442$11381)，檢索日期：2022年2月8日。

這片位居內陸的地理空間，根本就是傳統上所稱的「西域」。陸容何以毫不遲疑地改用「早西洋」這樣的用詞呢？不就是因為明朝人認知到從海上可以到達的傳統「西域」某處，從海路也可以到達，而後者是「西洋」的一個點。這意味著「西洋」與「西域」都是指中國以西的地方，從海上去就是「西洋」，從陸上去就是「西域」。甘肅以西所到的地理空間本來都叫作「西域」，但是稱作「早西洋」也真的很有道理，也很有趣。

是西域，也是西洋

明代人會認為「西域」也是「西洋」，這應當與鄭和曾經造訪過波斯灣頭的忽魯謨斯有關。

鄭和「下西洋」的「西洋」，狹義而言，指的是古里（舊作 Calicut，今作 Kozhikode，並

改譯為科澤科德），乃至於古里所在地的印度西部海岸。古里是鄭和奉使最初設定的終點，因此文獻上常說他去了「西洋古里」。

不過，廣義而言，「西洋」還可以指「西洋針路」及經由「西洋針路」所到的地方。所謂的「針路」指的是羅盤針所指示的方向。以現代西式羅盤而言，指針朝向 90° – 270° 一線時，所走的就是「西洋針路」。在這種情況之下，位在波斯灣頭的忽魯謨斯當然也算是西洋。所以永樂十五年（1517，第五次下西洋出發的那一年）鄭和在泉州伊斯蘭先賢塚前行香，鎮撫蒲和日立碑，碑文即說「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

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是由鄭和、王景弘、朱良、周福、洪保、楊真、張達等人在第七次下西洋前，於宣德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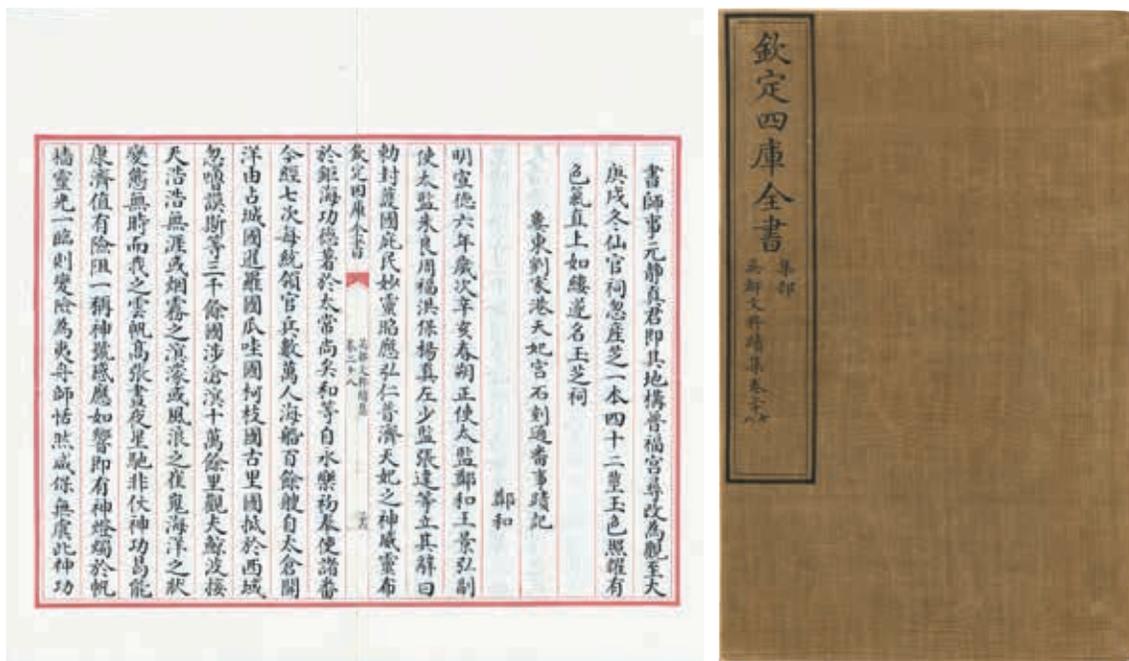


圖2 明 鄭和 《吳都文粹續集》 卷28 〈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記〉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33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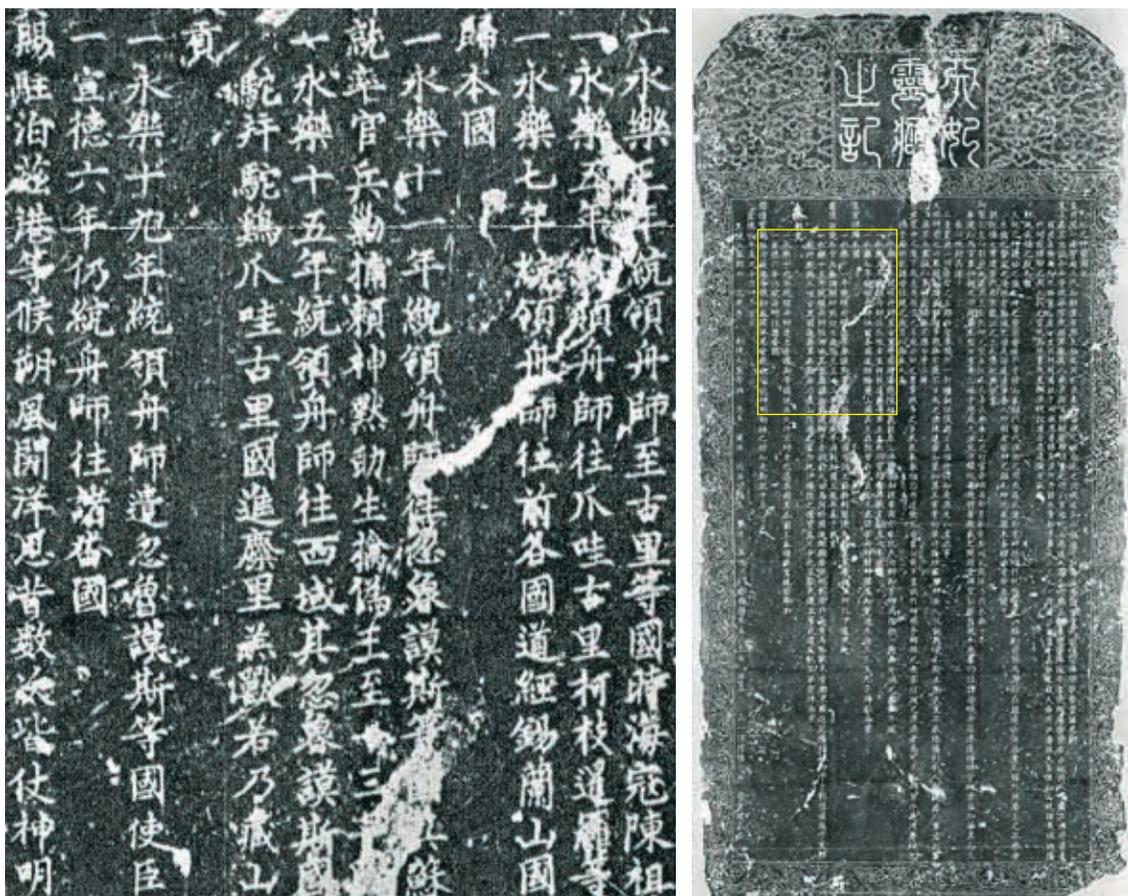


圖3 明 鄭和〈天妃靈應之記〉拓片 原碑藏福建省長樂市鄭和史蹟陳列館 取自Duyvendak, J. J. L. "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34, no. 5 (1939): 350-351.

(1431) 立在江蘇太倉劉家港的天妃宮。文中就說「抵於西域忽魯謨斯等三千餘國」（按，應該是三十餘國）、「永樂十五年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西馬」。明明白白以從海路到達的忽魯謨斯為西域。（圖2）

福建閩江口長樂縣的〈天妃靈應之記〉（一稱〈天妃之神靈應記〉）碑，立於宣德六年仲冬（十一月），立碑題名者有鄭和、王景弘、李興、朱良、周滿、洪保、楊真、張達、吳忠、朱真、王衡等人。其碑文也說：「永樂十五年，統領舟師往西域。其忽魯謨斯國進獅子、金錢豹、大西馬。」（圖3）

從鄭和等人具名留下來的史料，可以看到他們時而將忽魯謨斯當成是「西洋」，時而又稱之為「西域」！為什麼既是「西洋」又是「西域」，這就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一下為何永樂皇帝（1402-1424 在位）要叫鄭和從海路前往忽魯謨斯「下西洋公幹」？

鄭和奉使忽魯謨斯

鄭和下西洋七次，前三次以西洋古里為大鯨（主船隊）終點，後四次以忽魯謨斯為大鯨終點。分鯨（分遣隊）分別在沿途一路派出，而以馬六甲、古里為任務完成後的集結地，集

結後返航，部份分鯨則不與大鯨會合而獨自返航。〈鄭和航海圖〉（原稱〈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如果確實是鄭和船隊使用過的航海圖，則當認定就是以大鯨所至之處為準而繪製的航海示意圖。因為大鯨所至最遠的地點是忽魯謨斯，所以〈鄭和航海圖〉的最後一頁畫的就是忽魯謨斯，而不是更遠（更西）的紅海、亞丁以及東非海岸。（圖4）

那麼，為什麼在第四次下西洋時，大鯨寶船的終點要從古里延伸到忽魯謨斯呢？或者說為什麼不派個分遣隊去就好呢？鄭和本人確實是在進行到第四次時才奉命前往忽魯謨斯。（1412年受命；1413年冬出發；1415年夏大鯨歸國；1416年夏分鯨歸國。）《明史》提供遣使忽魯謨斯的背景如下（圖5）：

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樂十年（1412），天子以西洋近國已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猶未賓服，乃命鄭和齎璽書往諸國，賜其王錦綺、綵帛、紗羅，妃及大

臣皆有賜。王即遣陪臣己即丁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十二年（1414）至京師，命禮官宴賜，酬以馬直。比還，賜王及妃以下有差。自是，凡四貢，和亦再使。後朝使不往，其使亦不來。

「再使」直言是出使兩次的意思，「和亦再使」是說鄭和去了兩趟。具體的情況是從第四次下西洋到第七次下西洋，大鯨寶船最後的終點，也就是最西的船隊結集地，一直就是波斯灣頭的忽魯謨斯。鄭和本人更於第四次（1413-1415）及第五次（1417-1419）親自到臨。永樂十九年（1421），第六次出發，遣還忽魯謨斯等國使臣，但是鄭和在中途就被召回。大鯨於二十年（1422）先行歸國，分鯨於二十一年（1423）歸國。至於第七次下西洋，鄭和至多也只到達古里。因為鄭和只去了兩次忽魯謨斯，所以說是「再使」。

鄭和本人實際上只到忽魯謨斯兩次，而且皆由水路前往忽魯謨斯，因此忽魯謨斯為西洋邦國；然而《明史》說他「再使」，難道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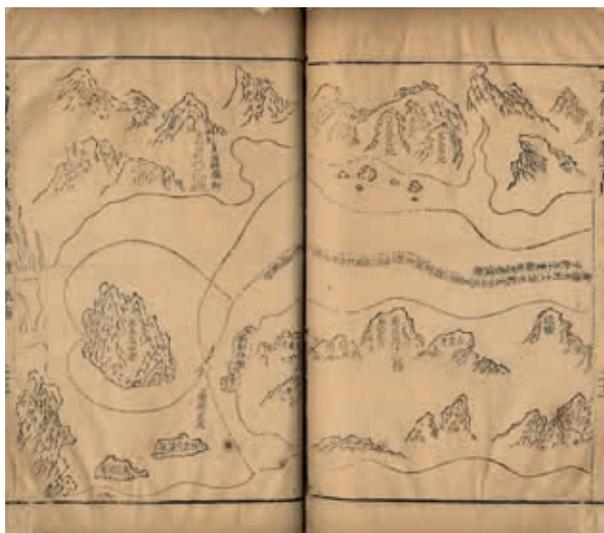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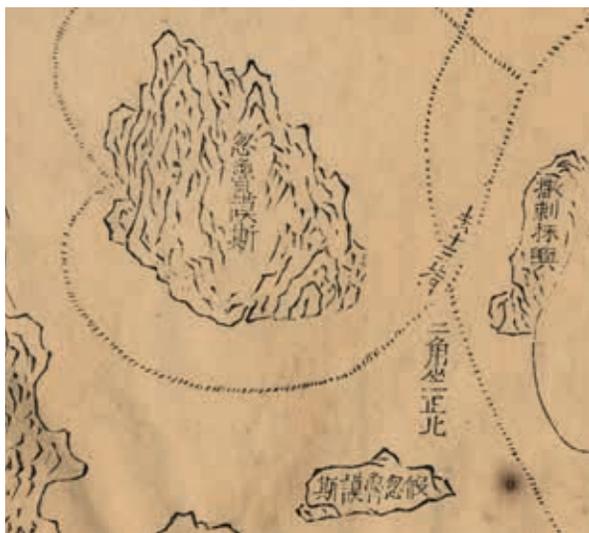


圖4 明 茅元儀輯 〈武備志·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



卷240 明天啓元年刊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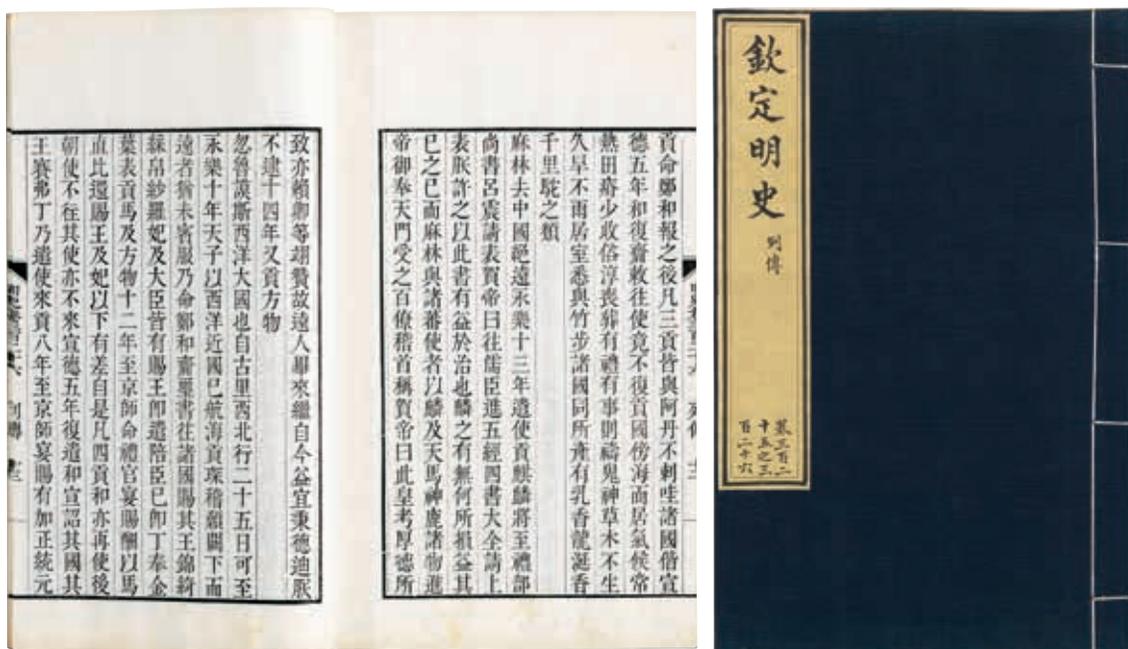


圖5 清 張廷玉等編 《明史》 卷326 〈外國列傳·忽魯謨斯〉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博物院藏 故殿020782

爲了「齋靈書往諸國，賜其王錦綺、綵帛、紗羅」嗎？忽魯謨斯當時並不歸屬帖木兒帝國，離中國甚遠，實在沒有遣使交往的絕對必要。但是從忽魯謨斯登陸，北行不遠即到沙哈魯的都城哈烈。鄭和親身到忽魯謨斯，是有可能轉往哈烈爲大明天子辦交涉吧！以下謹作簡單推論，敬供讀者參考。

從第四次下西洋，將大鯨寶船的終點由古里延長到忽魯謨斯，多少需要一些解釋。前引《明史》的確提供了解釋，但是太平常了，好像認爲是一種自然的結果——既然前三次都到了古里，已在西部印度洋的東緣了，那麼進入西部印度洋內部活動，再自然不過，不是嗎？

長久以來，忽魯謨斯就是波斯灣頭的主要港口，到那裏去找貿易機會，本來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早在一百多年前，楊樞（1283-1331）就曾經因護送使臣回波斯，而從長江口一路揚帆到

達忽魯謨斯啊！浙江金華人黃潛（1277-1357）所寫的〈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楊君（樞）墓誌銘〉云（圖6）：

大德五年（1301），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二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如其請，奏授君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1304）發京師，十一年（1307）乃至。其登陸處曰「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糗糧物器之須，一出於君，不以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葡萄酒、蕃鹽之屬以進。

楊樞原本前往印度半島貿易，順道帶了伊兒汗國（Ilkhanid Khanate）的使臣那懷到大元首都。

隨後護送使臣回國，到忽魯模思，也就是忽魯謨斯，下船登陸。

大明與帖木兒帝國的瓜葛

不管是撒馬爾罕還是哈烈，離開中國的南京或北京都很遙遠，可是明成祖與帖木兒（1336-1405）、沙哈魯（1377-1447）父子卻有不少瓜葛。

官方文獻（鄭和立的碑或者《明史》、《明實錄》等書）都沒有提到為何要去忽魯謨斯，但若只是像楊樞那樣應邀陪合贊汗使臣歸國，而非另有重要任務，則鄭和實無親往的必要。我們因此假定他負有與哈烈交涉的外交任務，但事屬機密，所以文獻都不提。至於通譯馬歡（生卒年不詳）及費信（1388-?）等人，則是層級太低，不可能分享機密，所以只能記錄普通的見聞。至於明朝宮廷必須與哈烈進行交涉，也有其歷史背景。

依據《明史》〈西域傳〉所載，洪武二十年（1387）帖木兒首度以撒馬爾罕的國名來貢馬及駱駝。（圖7）二十七年（1394）來貢之後，朱元璋在下一年（1395）派遣傅安、郭驥、姚臣及宦官劉惟等一支龐大的使節團（《明史》說他們「攜士卒千五百人往」）前往報聘，卻被留下來，並且被安排到帝國境內各處參訪，誇耀帝國之壯大，直到帖木兒都已經過世兩年後的永樂五年（1407）才讓他們回到大明國土，前後達十三年之久。

帖木兒出生於中亞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河中」（Transoxiana）地區，因此以撒馬爾罕為都城。不過，他長年在亞洲西部征戰，直到1404年，也就是明成祖永樂二年，才回到撒馬爾罕，準備揮師東進以征服中國。當時正好有來自歐洲西端卡斯提爾的使臣克拉維約（Ruy



圖6 元 黃潛撰《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8〈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 明嘉靖十年虞守愚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3608

Gonzalez de Clavijo) 造訪帖木兒宮廷，也記錄了這件事。克拉維約一行在1404年8月31日抵達撒馬爾罕，9月8日獲得帖木兒的接見，11月21日出發回國。當克拉維約離開撒馬爾罕之時，帖木兒卻患了重病。隨後他短暫恢復健康，並於1405年1月踏上征討中國的道途。然而，在2月間到達錫爾河畔的訛達刺（Otrar）時，舊病復發，隨即於18日病故。

帖木兒去世前已將他所建立的帝國劃分成幾個區塊，封給他的子孫去統治。原本得到撒馬爾罕的是他的長孫，但隨即為另一個孫子阿里（Khalil Sultan bin Miran Shah）搶奪到手。但是實力最強、能力最佳的是他的第四子沙哈魯·把都兒（Shahrukh Bahadur, 1405-1447在位）。沙哈魯被封於呼羅珊（Khorasan）地方，核心據點就是哈烈，這裡本來也是帖木兒長年征戰時常駐的地方。哈烈，即今阿富汗之赫拉特（Herat）。經過一番權力爭衡與戰鬥，1407年



圖7 清 張廷玉等編 《明史》 卷332 〈西域列傳·撒馬兒罕〉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11701



圖8 明 15世紀中葉 靈青地孔雀綠龍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012626

時，沙哈魯被承認為河中之王，同時也是帖木兒帝國的君主，哈烈自然成為帝國的首都。

哈烈離開中國甚遠，沙哈魯對往東擴張帝國的興趣不高，大明帝國與帖木兒帝國兩國之間

的緊張關係得以緩和。沙哈魯也致力於工藝美術與其他文化事業的提倡與獎掖。沙哈魯在位期間，哈烈成為伊斯蘭文明的中心。其子烏魯克·伯格繼位（Uluğ Beg, 1394-1449, 1447-1449在位）的幾年，風華如故。（圖8）

1407年，撒馬爾罕當局將傅安等人釋放回國。隨後近乎半個世紀，帖木兒帝國與大明帝國通使不斷、通商不斷、文物的交流也持續不輟。兩國之間的往來，留下若干紀錄。就中文材料方面來說，主要有兩組：永樂十二年，陳誠（1365-1457）曾經以副使的身分，訪問了包括撒馬爾罕與哈烈等處。回國之後，將他所經過的各地山川、城廓、風俗、物產以及途中見聞，編寫成《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各一卷。（圖9）這也成為明代撰述以及清代編纂《明史》時，描述西域各國的史料來源。另一組資料則是鄭和下西洋隨行人員的紀錄：即《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三本紀行作品，後來黃省曾也據以編著《西洋朝貢典錄》一書。此外，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成書的時間雖然晚，但是根據歷代官方留下來的資料編寫而成，史料價值很高。

帖木兒帝國方面自然也有文獻傳世，最容易看到的是以下這件：永樂十七年（1419），沙哈魯派遣其子 Mirza Baysunghur 帶領一個使節團前往大明訪問，Baysunghur 要隨團的畫家蓋耶速丁（Ghiyath al-Din Naqqash）逐日記錄使團活動。該團經過中央亞細亞通道前往大明，在撒馬爾罕時還加入若干帝國內其他王國的使節，同赴中國。蓋耶速丁完成的作品後來以《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之名問世。

傅安等一行人曾經花了六年的時間被安排去見識帖木兒帝國的偉大，他們當然知曉自忽魯謨斯與哈烈聯繫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他們

無疑會向皇帝報告他們的所見所聞。其實，皇帝說不定老早也知道百年前楊樞造訪過忽魯謨斯的先例。

在傅安等人歸國之後，兩國的友好關係本來已經經由陸路往來而建立，讓鄭和經海道造訪哈烈，或者只是嘗試嘗試不同的可能性吧！無論如何，1409年第二次下西洋船隊一歸國，第三次就又緊接著出發，沒有時間準備。但是1411年第三次下西洋船隊歸國後，皇帝隨即在1412年下令鄭和前往忽魯謨斯。只是要深入西部印度洋，進入伊斯蘭世界的核心，需要收集航海資料，同時還要一些會阿拉伯語的語言人才，總要做些準備。於是鄭和長途跋涉到西安，

親自延請清淨清真寺的掌教哈三隨他遠航；他並且也徵召了穆士林馬歡擔任通譯，這是馬歡第一次下西洋！

第四次出使之後不久，第五次（1417-1419）下西洋就跟著舉行。當1419年鄭和首途歸帆的時候，沙哈魯也讓蓋耶速丁一行預備從陸路前往中國。他們在1419年年底出發，1420年12月14日抵達北京，1421年5月18日離開北京踏上回去哈烈的歸程。

鄭和於1421年年底再次展開第六次下西洋之舉，原本可能也要三訪忽魯謨斯或哈烈。不過他人還在海上時就被召回。為何中途折返的原因並不清楚。有一說是說北京在永樂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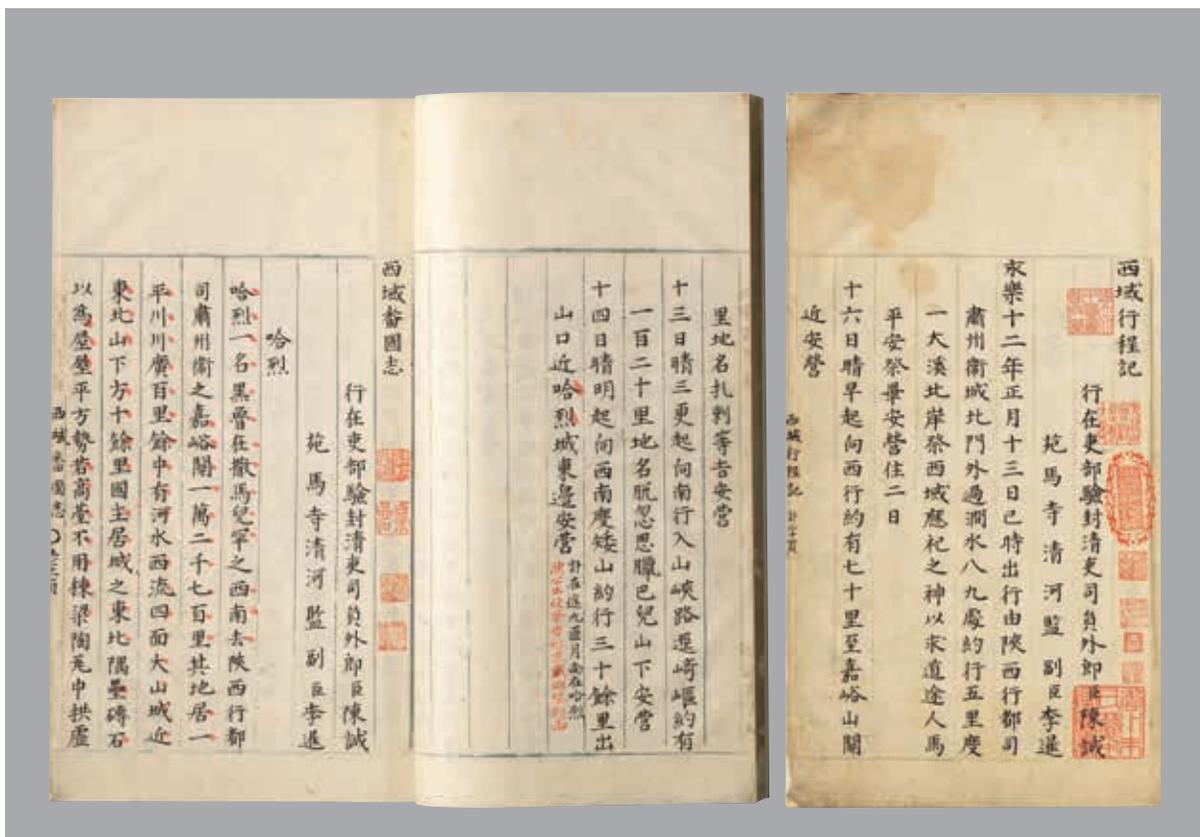


圖9 明 陳誠撰 《西域行程記》、《西域蕃國志》 明藍格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9012

(1421)正式由行在改為首都。不過也有可能是蓋耶速丁等帖木兒使節還在北京時，永樂皇帝騎了他們進貢的馬，不巧摔下，健康上出了狀況。蓋耶速丁的紀錄就提到他們就是在皇帝摔馬生病之後，被下令回國。

無論如何，當年帖木兒預備向中國進軍的威脅，在帖木兒過世、傅安等人釋回之後，永樂皇帝與蘇丹沙哈魯之間經國多次交聘，應該已經確定衝突的因素不復存在，雙方可以和平往來，談判或交涉的重要性減低了。如同《明史》〈西域傳〉記載宣德七年（1432）由中官李貴帶去給沙哈魯的敕諭所言，兩國「相與還往，同為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遂所願」。因此下西洋船隊雖然繼續前往忽魯謨斯，但也只是做做生意，不再負有外交任務。鄭和也就可以不再前往忽魯謨斯了。

忽魯謨斯的見聞

馬歡第四、六、七次下西洋時隨行當翻譯，當中第四次鄭和也到了忽魯謨斯。馬歡所寫的〈紀行詩〉，收在其《瀛涯勝覽》一書，詩中提到離開古里以後：

欲投西域遙凝目，但見波光接天綠。
舟人矯首混西東，惟指星辰定南北。
忽魯謨斯近海旁，大宛米息通行商。
曾聞博望使絕域，何如當代覃恩光？

前往忽魯謨斯對馬歡而言就是「欲投西域」。正使用了張騫通西域典故。大宛（Ferghana）位於今天烏茲別克共和國的東部，離開撒馬爾罕不算遠，曾經是中亞重要的商業中心。米息即Misr，埃及開羅的舊名。

馬歡紀行詩的前兩句說明忽魯謨斯的位置是在海邊，也就是一個海港。他特別點出大宛與米息，兩個分處忽魯謨斯東、西方的遙遠城

鎮。忽魯謨斯能吸引那麼遠處的商人過來貿易，顯見得它是個重要的國際港口。馬歡也感歎說曾經聽說過博望侯張騫出使西域的故事，沒想到自己竟然獲得這樣的殊榮與恩寵，有機會親身跟隨使臣來到西域。

詩歌之外，馬歡更有長篇文字描寫忽魯謨斯。《瀛涯勝覽》〈忽魯謨斯國〉條直接說「各處番船并早番客商都到此地趕集買賣，所以國民皆富。」他說當地萬商雲集，因此「各番寶貨皆有」。此外還有珍貴的寶石和各種精巧的織品。他更觀察到當地可見的珍奇動物，例如他說：

又出一等獸，名草上飛，番名昔雅鍋失，如大貓大，渾身儼似玳瑁斑貓樣，兩耳尖黑，性純不惡。若獅豹等項猛獸，見他即俯伏於地，乃獸中之王也。

「昔雅鍋失」是波斯文「siya gush」的譯音，這種動物我們現在把牠叫做羆貓（caracal）。另一位也下西洋當翻譯的費信則記錄牠叫作「哈刺虎刺」，接近土耳其語的「karakulak」。或許忽魯謨斯當地五方雜處，兩個人分別聽到不同語言的叫法吧。

費信參與了第三、第四、第七次下西洋的行動，後兩次與馬歡相同。費信也寫了一首詩描寫忽魯謨斯，詩云：

忽魯謨斯國，邊城傍海居，
鹽山高岸嶺，酋長富盈餘。
原隰唯收麥，牛羊燠食魚。
女纏珠珞索，男坐翠氍毹。
瑪瑙珊瑚廣，龍涎寶石珠。
蠻邦成絕域，歷覽壯懷舒。

費信的詩不談貿易，倒是留意到在地的產業有鹽山，原隰種麥，而「牛羊燠食魚」是說牛、羊以魚乾為食物。費信在《星槎勝覽》〈木骨

都東)條也說「駝、馬、牛、羊皆食海魚之乾」。中國古代的記載往往提到環阿拉伯海世界沙漠國家的人民用魚乾來餵食牛、羊。例如，第八世紀唐代杜環的〈經行記〉記麻林國時就說「馬食乾魚，人食鶻莽」了。至於明代後期禮部行人司官嚴從簡，在他的《殊域周咨錄》〈忽魯謨斯〉條也這樣描述該地：



圖10 明 宣德 甜白蓮瓣紋蓮子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3105

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海魚乾。……

從古里到忽魯謨斯的航程，《明史》和馬歡都說要花二十五天。嚴從簡卻說只要十晝夜，或許是夜間也航行因此比較迅速吧！他的描述與馬歡、費信大抵一致，但是對忽魯謨斯生產岩鹽的事倒是特別在意，說是「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斂為盤碟、碗器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再回頭看一下元朝時楊樞從忽魯謨斯帶回大元的禮物當中，不就也有「番鹽」一項嗎？

費信與馬歡都沒有參加第五次下西洋的活動。至於鞏珍則只參加過第七次。他們三個人地位都不高，很多事情顯然都沒有機會參與。雖然對忽魯謨斯的民情與物產作了一些相當好的觀察與報導，但是無助於對鄭和前往忽魯謨斯的任務的了解。我們倒是從他們的作品以及鄭和參與刻石立碑的文字中，認知他們把忽魯謨斯當成西洋，也當成西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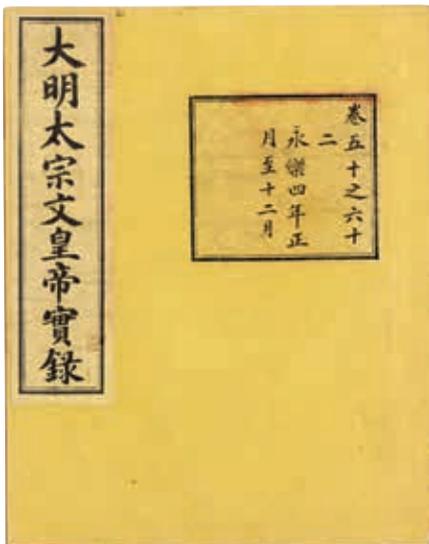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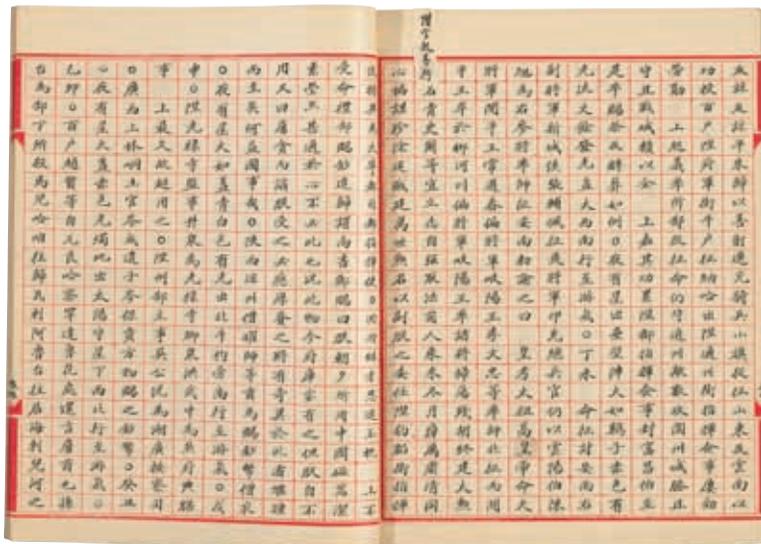


圖11 永樂皇帝對中國瓷器的評語 明 楊溥等撰 《太宗文皇帝實錄》 卷60 永樂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明朱格鈔配補近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04011

結語

1407年以後，北京與哈烈相互遣使。相互饋贈的禮物，見諸於《明實錄》等中國方面的文獻，帖木兒帝國方面的禮物經常包括有獅子、西馬、文豹，經常也還有玉石；大明方面的贈與則往往包括了東青（獵鷹）、織金文綺、瓷器與紙張。

從這樣的文字紀錄實在很難看到雙方在美術工藝上的交流。不過不管是沙哈魯、烏魯克·伯格、明成祖朱棣，還是明宣宗朱瞻基都是重視文化藝術的君主，在彼此送出的禮物上互別苗頭，實屬常情。明成祖曾經以說過「中國瓷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的名句廣被傳誦。（圖10、11）其背景是永樂四年（1406）十月，有位名叫結牙思的「回回」（穆斯林），進呈

一枚玉枕。皇帝將禮物退回不收，但是還是給了賞賜，並且對大臣作了以上的表示。皇帝睡覺當然還是要用枕頭，但是可以用瓷枕而不必用玉枕。同樣的道理，優秀的帖木兒工藝美術作品，中國可以直接取得使用，但是若欣賞其造型設計的趣味，也不見得非用外國貨不可，反而也可以利用中國固有的材質與工藝技能，依樣製造。反過來，撒馬爾罕或哈烈不也可以仿製中國的器物嗎？十五世紀當中，亞洲大陸兩大文明的這種交流，熱熱烈烈地展現了時代的繁榮與大氣。由於十五世紀時有過這一段大明與帖木兒帝國之間的文化往來，因此我們才能在「航向天方——十五世紀的伊斯蘭印象」特展看到一個豐盛的展覽啊！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書目：

1. 廉亞明 (Ralph Kauz)、葡萄鬼 (Roderich Ptak) 著，姚繼德譯，《元明文獻中的忽魯謨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
 2. 鞏珍原著、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3. 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臺北：中華書局，1970。
 4. 陳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5. (明)陸容，《菽園雜記》，收入《國朝典故》，冊18-19，明朱絲欄鈔《國朝典故》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6. 張文德，〈15世紀後期撒馬兒罕使臣海路來華與明廷的反應〉，《西域研究》，2003年4期，頁38-45。
 7. Bretschneider, E.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Fragments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rom the 13th to the 17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7.
 8. Ptak, Roderich. *Birds and Beasts in Chinese Texts and Trade: Lectures Related to South China and the Overseas World*.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1.
 9. Fletcher, Joseph 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206-22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0. Naqqash, Ghiyathuddin. "Report to Mirza Baysunghur on the Timurid Legation to the Ming Court at Peking." In *A Century of Princes: Sources on Timurid History and Art*, edited by W. Thackston., 279-297. Cambridge, Mass.: The Aga Khan Program for Islamic Architecture, 1989.
-